「武漢起疫」北京陷入孤立

文｜燕茱莉、聞天清
圖｜ Getty Images

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（又稱：武漢肺炎）疫情持續在惡化，中共官方確認死亡人數已經超過當年SARS全球致死人數。從疫情初期的「可防可控」、「沒有出現人傳人」的現象，到小區封閉式管理，甚至封城、封省，導致千百萬人生計無著、病人難以就醫等人道災難。官方專家所預估的元宵節疫情拐點也並未如期而至，中共當局也陷入公共衛生危機與前所未有的被全球孤立的困境。

1月26日，《科學》雜誌（Science Magazine）稱，2019年12月1日出現武漢肺炎首例病例，患者沒有去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。

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曾發布通報稱，2019年12月8日，首位到醫院就醫的病例出現症狀。12月下旬開始出現大量武漢肺炎患者。12月31日，武漢官方開始通報病例。2020年1月7日晚上9時，北京官方才確認病毒是2019新型冠狀病毒。1月13日起，泰國、日本等相繼確認境內出現來自武漢的病例。1月19日，中共官方依然聲稱沒有發現病毒存在人傳人的證據。武漢官方承認不排除有限度人傳人，但疫情仍屬可防可控。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在1月20日確認，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現象。同日，中共官方發布公告宣布，武漢肺炎納入法定乙類傳染病，按甲類管理。

1月23日凌晨，武漢官方宣布上午10時開始封城。隨後，湖北省大部分城市也採取封城防疫措施。1月30日，世界衛生組織（WHO）宣布武漢肺炎疫情為「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」（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，PHEIC）。

如今，中國元宵節已過，官方專家所預估的疫情拐點依舊沒有如期而至。美國《紐約時報》稱，「武漢肺炎」對中共的合法性絕對是一大震撼，疫情衝擊程度僅次於1989年北京「六四」事件，也是對中共體制與管理能力的重大考驗。

針對北京當局處理武漢肺炎的方式與舉措，《看中國》記者採訪了旅居加拿大自媒體評論人士張新宇、美國時政評論家陳破空和歷史文化學者章天亮。

武漢肺炎疫情是中共體制的專利產品

談及中共治下錯失防控武漢肺炎疫情良機時，張新宇認為，武漢肺炎基本上就是中共獨裁制度下的一個專利產品。「獨裁暴政是人類的公敵，而中共現在這個統治集團就是一個專制暴政，武漢肺炎這樣的疫情只有在專制暴政的制度下才能夠發生，而在民主世界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不可能發生的。因為，專制社會是外行管控內行，奴才管理人才，用過去死人的思想來管控現在活人的頭腦，這是獨裁暴政的特徵。」

張新宇稱，中共專制獨裁社會的統治者頭腦中都是自己的權力，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。它對社會上所有的社會現象都會懷疑是反革命或者是來奪權的，所以，它把維穩看作是最重要的。在沒有任何科學思考、不尊重專家的情況下，最終就導致了武漢肺炎這樣的疫情。張新宇說：「疫情發生後，武漢市政府，包括當地防治疫情的部門和醫療單位，也都沒有全力以赴地處理這件事。因為他們要想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要先上報，上面的又都是『無才』，都是『小學畢業水平』的人，由他們來決定要不要做甚麼事。中共就是這樣一個獨裁統治。所以，本來應該從2019年12月1日就應該處理的事請一直拖後了50天，所有這些都因為獨裁專制統治的結果。」

張新宇還評論分析了中共體制的弊病。他說：「中共為甚麼是暴政呢？因為它任人唯親，在中共現在這個國家機器上找不到一個合格的領導幹部，全是不稱職的。它任命幹部是要任命那些一起扛過槍、一起嫖過娼和一起分過贓的人，屬於他們自己人。包括這次武漢發生這麼大的事情，下面上報到李克強也沒用，李克強也拍不了板，一定要習近平來拍板。結果習近平還不相信，他還得派他自己的人，就是鍾南山和那些專家，又跑到武漢去親眼看了以後，回來告訴他，他才相信，獨裁專制就是這樣的。所以，到了1月20日以後全國才動起來，所有的疫情數據才開始統計出來。我們暫且不說那個病毒是不是那個（武漢）P4實驗室造出來的，我們就說在疫情發生之後，它的擴散和爆發這個大災難事件。它就是中共這個專制暴政制度的一個專利產品，只有它才能生產出來，其他人生產不出來。」

相比之下，西方民主國家處理類似武漢肺炎疫情會是怎樣的情況？張新宇表示，在加拿大溫哥華、美國洛杉磯及臺灣，只要是一個自由社會的國家或地區，他們都是內行管內行，其特點是沒有任何領導，任何位置上的人員都是經過優勝劣汰。「一個行業的領頭人在本行業都是最專業的，沒有必要去請教任何人，而是所有人都要請教他的。每一個人的位置角色都知道自己該做甚麼，他也是在這個行業內最知道該做甚麼的人。在整個自由世界各種崗位上工作的人都是在該領域有特長的、最專業的人員。」

任何國家都會有政治行為，西方國家也不例外。張新宇認為，從政治的角度來看，三權分立制衡與監督、多黨互相競爭和媒體輿論監督等等。例如，在加拿大溫哥華Richmond醫院出現一例用任何一種抗生素都沒有療效的肺炎，醫生就會認為是SARS或類似SARS的疾病，他就可以決定將病人隔離，然後再進行研究治療。與此同時，溫哥華新聞媒體採訪以後，立刻就可以決定將此新聞放在頭版，無需找加拿大總理或省長去批准，在民主社會是沒有這樣的事情。民主社會特點就是每個人都有一個角色，每個人也知道自己該做甚麼，不需要事事都要去請示別人。

他說：「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，只有上級告訴你可以做甚麼的時候，人才可以做甚麼，很可笑的。共產黨掌控這70年，中華民族所經受的人為災難比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要多好幾倍，如動車和去年的水災等等，可以說幾乎都是人禍，都是共產專制暴政集團的專利產品。」

章天亮：武漢肺炎對中共而言是政治問題

對中共治下的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不斷蔓延，旅美歷史文化學者章天亮教授說：「中共它是一個政治掛帥的體制。其實像肺炎這種東西，它是屬於公共安全問題，屬於公共衛生問題。但是對中共來說，它是一個政治問題。它比較擔心，如果這個疫情一旦擴散之後會影響到它的經濟。因為中共它的合法性是跟它的經濟綁定在一塊兒的。如果要是經濟不行的話，中共感覺就是說它的統治就比較難以維繫。」

章天亮認為中共非常注意宣傳自身形象的問題，這也是武漢肺炎疫情錯失放空良機的原因之一。他說：「再一個就是共產黨它想給老百姓樹立一個形象，就是它是無所不能的，它甚麼都能戰勝的，好讓大家去相信它。但是就是這個疫情的話，它其實戰勝不了。所以這種情況下，它就是在賭。賭甚麼呢？就是希望這個疫情到溫度不太合適的時候突然就受控制了。就像那個SARS一樣自然就消失了。所以，它當時實際上賭的是這個疫情不會傳播那麼廣，不會人傳人。或者即使人傳人的話，傳播力不會那麼強，強的話也不會死，死的話也是短暫的，就是它賭很多東西。然後它就不把這個東西告訴給大家。但是現在因為這個是瞞不住了嘛！他就不得不說了。」

章天亮表示，在美國這種民主國家，其政治跟經濟是分開的。對美國政府來說，類似武漢肺炎疫情對其執政合法性不會造成任何挑戰。「就是經濟也好，疫情也好，對他的執政合法性不會造成挑戰。所以這種情況下，加上是民主國家，如果你要是對人民的這種安全不能提供有效保護的話，那老百姓肯定會把你選下臺的。所以這種制度的話就決定了它一定會盡快、盡全力把疫情的影響縮到最小。」

陳破空：美國民主本質與中共獨裁完全不同

旅美作家、政治評論家陳破空認為，美國是一個民主大國和社會，如果發生任何的公共危機、天災人禍，就會是整個社會的動員。首先媒體、記者會趕到現場進行採訪報導，然後地方政府等任何負責方就會舉行記者會發布處理的情況，由於美國地方政府擁有自治能力，可以調動人力、物力、財力進行支援，各部門都會投入拯救生命或者是抗擊災害這種程序運作中。

陳破空說：「聯邦政府，中央政府也是在透明的情況下運作。他必須一方面是要撥出援助，再一個就是要趕到現場。像美國如果發生洪水的話，通常總統都是首先要到達現場，第一時間到達現場。如果稍微有遲緩，他會受到選民的抨擊，甚至有可能給他自己的政治帶來不利。比如說遇到選舉，不僅對他本人不利，有可能對他的執政黨、他所在的黨都帶來不利。所以美國是個充分民主的國家，高度民主的國家，是人類社會民主的一個成熟的形態。」

陳破空表示，美國新聞自由、司法獨立，與政府所受到的監督和制衡必然表現出整個社會一種同心協力、一種全方位的關注。新聞媒體上也會以頭版頭條進行報導。這跟中國就形成了完全的對照，所以為甚麼這些事都發生在中國，不管是2003年的SARS瘟疫，還是近幾年的禽流感、非洲豬瘟和鼠疫，一直到現在的武漢肺炎。

陳破空說：「這些事情發生在專制的中國，不是在相對自由的香港，不是在民主的臺灣，也不是在民主國家日本，也不是在民主國家美國，這是有原因的。因為它的起因，它發生的本身就是制度的弊端，制度之禍、制度之惡，制度所開的惡之花。所以這個制度我們看到，不僅這些災難是這個制度帶來的，災難發生之後，這個制度在災難上可以說是把天災人禍交加在一起，人禍復人禍，人禍何其多。我們看到它跟美國或民主社會的對比，第一：新聞，所有的新聞，電視、報紙、網站都由黨來控制。而它的控制主要就是掩蓋，就是掩蓋分歧。然後政府與政府之間互相推諉，使地方政府失去自治能力，不能做主，完全依賴中央政府，所謂定於一尊來拍板。」

陳破空還提及民間力量和公民社會在美國的重要性。他認為，非政府組織包括公義社會、公義組織等都被中共斬盡殺絕了。尤其最近這幾年，中國社會自救能力也完全被削弱、被剝奪，只能坐等中共政權採取行動。然而，中共當局往往都是行動遲緩。因為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來去互相推托，再加上信息掩蓋，就耽誤了寶貴的搶救生命的最佳時機。最後不管是時間成本，還是人力成本，都疊加在那裡，可以說使人禍怵目驚心，後果相當的嚴重。

談到美國與中共政權的本質不同時，陳破空說：「美國這個社會啊，是小政府大社會。它主要靠社會的動員，而政府受到充分的監督。所以，政府犯錯，或者是製造人禍的可能性降到最低。而中國剛好相反，它是大政府小社會。所以這個大政府呢，就是很容易製造人禍，而社會對它的監督和約束能力呀幾乎等於零。」

陳破空認為，由於是小政府大社會，三權分立，互相監督、互相制衡，這種民主制度就必然使政府將大量的資金、資源、人力、物力投入到與民眾切身利益相關的方面。比如說民生、衛生、教育或者是福利，或者是社會應急機制等。但中共專制的社會則相反，首先投入的是確保所謂政權安穩，或者是政權的民生。所以，中共最大的人力、物力等資源投入首先是維穩開支費用。而這個維穩就是將槍口指向了人民，隨時會封口，封殺言論，封鎖人們的信仰、自由或者是基本的權利。

中共維護其獨裁政權的穩定必然要依靠軍隊，陳破空表示，通常在正常國家中，軍費本來是作為國防用途，這是真正的軍費。中共掌控的軍隊是槍口朝內的，就像這次武漢發生事情一樣，中共都是軍方人員去接管醫院。中部戰區軍隊圍困武漢及湖北，實際上是防止民變。這些軍方人員並不都是軍醫，大部分人與醫學領域毫無關係。它的出發點，一方面是為了封口，另一方面是隨時鎮壓民眾遊行、示威、抗議，或者是起義和民變。

陳破空說：「所以這樣的話，當中國發生大災難的時候，應對災難應急的資源根本不夠。就我們看到這次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，號稱可以上太空，可以下深海，可以快速建成人工島，可以在南海擴張，讓小國不敢吱聲。但是我們看到這樣一個大國，連口罩都不夠，連口罩都生產不出來，連醫療設備，連醫療資源都不夠，是因為它根本沒有在這方面有投入；第二他們成立了所謂應急管理部根本也沒有起作用，在2018年初建立了應急管理部有甚麼作用？應急管理部成立以來，它的部長，一個叫王玉普的部長，根本就銷聲匿跡，根本這種政治上莫名其妙。為甚麼一個部長出任之後兩年都沒有露面？是重病那就應該換，如果是落馬了，那應該有新人換上。如果是其他原因，政府做個解釋，所以連應急管理部也不能起作用，最後都是聽所謂黨中央一聲令下。到最後是所謂要定於一尊的這個最高領導人來發號施令。」

因此，權力不平衡，政府與社會權力的不平衡，還有中國大陸地方自治的瓦解、公民社會的匱乏，最後導致中國大陸沒有應急管理能力。如果說發生天災，那上面會疊加人禍；如果說發生人禍，就會人禍加人禍。所以，中共治下的社會必然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現這樣的慘禍，最後受損害的就是廣大人民群眾。其根本原因就是中共的制度。